

南风之薰

# 从“明朗的激越”到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

李荣

不知什么原因，突然想到了海顿，发愿把他的一百零四首交响曲，整个听一遍。当然，这样的发愿，多半是虎头蛇尾，只能“到哪里是哪里”吧。

海顿晚年在世时，莫扎特和贝多芬都是“领风骚”和“露头角”的年龄。所以，对于莫扎特和贝多芬而言，海顿是大师，也是老前辈。根据史载，莫氏贝氏都认海顿作自己的老师，但莫氏与海顿更亲近一点，这种亲近完全是心灵和性情上的一致，彼此很多相通的东西，甚至海顿反过来满心愉快地认年轻的莫扎特作“忘年交”，在自己晚年作品中吸取小辈的优点。这样的大师实在可当得“海纳百川”也。

而贝多芬于海顿，尊敬当然是不缺，但性格与作风上却总有不相容的地方，所以彼此的关系总像隔着一层薄纱，无间的互通有无更是谈不上。

但是海顿却是异常坚定地认贝多芬一定是后世的大家，并且在贝氏略显冷淡的态度下热情地说出这样的话：“我为成为他的老师而高兴并且自豪。”

这大约因为，贝多芬在性格上是最强的，有那种后世所谓的“扼住命运咽喉”的力量，所以对于海顿风格里的一腔柔情，总觉得有点“生分”。

而海顿却明白，贝氏的“不屈”可以说只是其表，他的内里其实也是一腔柔情——没有这个，成不了伟大的音乐家。我们听见贝氏的月光或晚期的一些作品，与海顿的“默契”可能会更多一点，只是他们那时已经不及见了。从这个角度上说，海顿对贝多芬的了解，可能比贝多芬自己还要更透彻一点。

海顿的乐观和明亮贯通一切。他的乐观有时像一把大扫帚，甚至把角落落里的那些灰尘和脏东西也扫出来，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，那面目也会改变一点。总而言之，海顿的乐观与柔情，把世间和人生“说开了”。

不过，翻阅西方乐评，不少乐评家都认为海顿早期的交响曲里面，总能听出一点紧张甚至于不安的感觉。本人听完海顿第二交响曲的第一乐章，多少能够理解那些乐评家的意思，但却觉得如此说法过于笼统——海顿在这里的一点紧张与不安的分子，与我们平时所用的这个措辞是完全两样的。乐章的开首，那音符的劲道很足，速度也是直冲向前的那一种，利落当中有着那么一点急切，明朗当中却还是有着一丝茫然。思绪干干净净，但至于如何具体地措其手足，好像不单单只是没有去多想——或

者是不愿意去多想，或者即使是想了却也是所得的结果自己也有点儿不踏实，而且更可能是想了，想得自认为也是有结果，却是在实行上不知道如何地来举手和投足。

这或者才是海顿音乐里面所谓的“紧张与不安”的分子，而其本质和本色却还是建立在明朗和利落上的。就像一个人因为朝气和活力而显得激越，踌躇满志，或者是壮怀激烈，我们在旁边看到，也是那么样地欣赏，并且自己也因此振奋起来，会走上前去，拍一拍他的臂膀，用一点柔情，把他因为激情和冲劲而显得有一点僵硬的情怀稍微转换一下，仿佛是把一样稍有点紧的东西，用手来摇一摇、抖一抖，让它顺一顺而舒展开来。在这整个乐章里，一起首显得有点“紧张与不安”的“明朗的激越”，在不间断的柔性音乐的调和下，越来越多地注进了生活的实在气息。起首主题一再出现，每一次都起一点变化，到了乐章的终曲，那实在是融成一片的舒心悦耳。

第二乐章，从我们“门外”的感觉来说，是一个“连绵曲”，一气连环，绵延不尽的样子，与巴赫《勃兰登堡》的第一乐章有点相像的地方。

当时，一听巴赫那曲子，我就想到夜色、水流与人的意识之流——仿佛都是这样的“连绵曲”，全体地看上去，好像有点单调和重复，“逝者如斯夫”，一去不回地只在那里往前，一步不停却

又是步履复沓地在奔走。但是当你稍稍地定睛看进那个“流动”里面去，或者把手试探着放进这个“流动”的内里去，感受一下它的那种“动力”，就多少能够看到或者感到各种不一样的东西，有激越有温柔，有灵动也有安静，有眩目也有素淡，有急切也有从容，总之是一个大千世界，却同时亦是一“整个”的。

海顿“第二”的这个乐章，仿佛也是在这个“连绵”之中，把一个世界和人的内心种种的千变万化，让它们完全地展开，到这个“流动”里面去各地奔走。你如果只在一个局部或者一点角落里去细看、细听、细想，只觉得那么多东西在那里活动着，仿佛物理世界里面的“布朗运动”，繁复得没有一点规则。但是，只要伸直了腰杆，走近几步，再来回看那一汪水面，却是清澈透底，水波不兴。当然，反过来来说也是一样，远远地看是一个样子，凑近了看便是另一个样子。只不过，到得最后，无论远近高低，无论里外上下，“相杂”却是“成文”，万物一家。

到了这首交响曲的末章，给人的乐感亦是干脆利落而且热情奔放，与这一曲的首乐章，粗听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区别。

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，首乐章里音符的劲道很足，速度也是直冲向前的那一种，但利落当中有着那么一点急切，明朗当中却还是有着一丝茫然。而在这个末乐章里，经过了中间乐章那一个

“万物一家”的远近高下、大小冷热、喜怒哀惧的连绵似的“一与多”的和应与融洽，那就完全可以说是到了中国古语所谓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的境界或者感受里。

这与“连绵曲”有点不同，这是一种“回旋曲”，好像是有点“怎么来都是可以”的意思，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地方。这个，你或者说只是大胆——当然说是大胆也没有什么错误——不过这种大胆，与不顾一切地孟浪却不一样。

孟浪似的大胆背后，其实还是担心，因为他不知道所谓的大胆过后，会接着遇到什么，就如英人康拉德所著《吉姆爷》里面的吉姆，勇敢无畏之下却是最大的畏惧。而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那样的大胆，却已经是把本来、然而与已然都是认作当然的，即使生活里面有他不知道的，他也不会把它看作空白、深渊或者是接不起来的断裂，而是如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所谓“都是连续的，没有虚空”。

这个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里面，有的人生所有的一切东西，并不是在人生里上下彻底地挑选一下，把好的、快乐的东西留下，把不好的、悲苦的东西抛掉。它里面有热情，也必有落寞，但是这个落寞却未始不是热情，就像美国诗人弗洛斯特笔下那一堆无人问津的柴堆，虽在那儿默默地朽坏，却正与炉膛里木柴的火焰一样，是在那里“燃烧自己”。



暮春中的梅花屏（国画）千飞

教室里的小脑袋，本来按课桌椅分布得横平竖直，放学铃响，大家离开座位，迅速形成新的聚落。要好的，已挽手臂互换零食。住得近的，商量结伴回家。女孩子们，约着同上厕所。一群群放笼的小雀，叽叽喳喳从教室飞出去。等学生散尽，办公室里的老师也陆续收拾包。只有宋老师任凭着有文具摊在桌上，茶杯敞开，苏苏冒着热气。她趴在走廊的栏杆上，看大家离校。

来接小孩的家长一仰头看见宋老师，都挥手打招呼。等走出学校一段，家长聊天，绕来绕去，说到宋老师，“还没呢”，家长们说。小孩子们一边打闹一边凑过来问，“什么还没呢？”家长们就说，“你们宋老师，和别人不一样。”

宋老师比我妈还大几岁。我妈有了我。我已经上学了。而宋老师还没结婚。女人如果年轻，人们会谈论她的未婚。已婚的多半想着做饭，未婚的男人要多点想头。但女人上了年纪，人们反而不谈论她的生活，只是交换眼色，如暗示一个秘密。

也似真有秘密一般，宋老师离群索居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个人分房全仰仗单位。在等候名单上，长长一列教职工名字，各自家庭都有紧迫困难。单身的宋老师，排得遥遥无期。校方好歹照顾，看到教学楼上阁楼空置，允许她先住去。

人人放学都要离校。唯宋老师不用。她在校园里安家，多么稀奇。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她和别的老师都不一样吗？

学校给每个教室装了闭路电视。别的老师上课都不太用，但宋老师上课，每隔几周会带录像带给我们放英语动画片。12月过圣诞节了，她申请学校食堂停了一日学生例行午餐，换成油炸大排和一铅桶咸菜番茄汤。她给我们讲西餐礼仪：叉子在左，刀具在右，挺直身体离开椅背，双肘不能支在桌面，喝汤时不能发出声音，要向外侧勺。我们并没有刀叉，也一样努力遵循礼仪，一个个笔挺坐着，用不锈钢饭勺在搪瓷饭碗认真地一勺一勺向外侧勺汤。

有家长听说了，不禁皱眉，“就不能带小孩好好背课文念单词吗？花头多来，到底是……”到底是什么，家长顾虑学生在边上，忍着没有说出口。但没有说出口的内容，其实连学生都知道了，“宋老师和别人不一样”。

英文课上课的内容，讲到了过生日。教材的插图里，英国父母手持气球，主角男孩戴尖头小帽，他的姐姐和朋友捧着插有蜡烛的蛋糕走来祝贺。原来英国人的生日这样过。但生日蛋糕在当年的上海，是奢侈品。同学们看着插图，面露羡慕。

到了下一节课，宋老师带着一只大纸盒走进教室，一打开，教室里哄然一声“哇”，原来是个巨大的奶油裱花蛋糕。宋老师笑一笑，重复几句教材里的单词和段落，取出带来的刀叉，小心分了几十份，班上同学每人都得了一小块。大家领了回各自位子上去吃，单词和段落像奶油一样，落进肚子化了。

冬去春来，美丽的班主任红着脸向家长们告假，她刚刚大学毕业，现在要去结婚了。另一位任课老师也在给同事发喜糖，他的儿子结婚了。所有人到了年纪都要成家。整个学校里的成年人都是如此，我从家庭里认识的每个亲属都是如此。除了宋老师。

有一天出完黑板报，我们几个学生在校里留得晚了。洗好手走出厕所，听到阁楼隐隐有乐声。大家循声

沈轶伦

## 阁楼里的简爱

走啊走，走到通往阁楼的楼梯前，你推我，我推你，扒着门缝看一看，那里面藏着什么。有沙发吗？有锅碗瓢盆吗？和我们家一样吗？宋老师会不会睡在课桌椅上，拿黑板当墙？直到背后传来一声咳嗽，大家回头一看，宋老师拿着一本托福教材站在阁楼外。

她开了门，让我们进去。大家一拥而入，很快塞满整个阁楼。这房间不过四五平方米的样子。窗下放着一台收音机，床边一把椅子，椅子上置一合收音机，椅子下面两只水瓶和一罐三合一的雀巢咖啡。所有陈设，一览无余。宋老师拉开床角的毯子，铺在床沿，示意我们坐在上面。窗户朝东，光照不够，她又开了灯。黄灿灿一只赤膊灯泡大放光芒，将陋室镀金。一时间，乐声中断。宋老师打开收音机，拿出磁带翻面。

一边拿出磁带，一边她问，来干嘛呢？我们相顾而笑。老师也笑，说，“觉得老师这里好玩？”我们说，觉得你和别人不一样。宋老师楞了一下，说，我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一个同学说，“我们放学回家，你家却在这里。”宋老师说，“是啊，你们回家，我家却在这里。”

她按下播放键。磁带转动，发出轻微滋滋，有一男一女对话，很快乐声响起，一个女人说：“你以为我穷、不好看，就没有感情吗？我也会的。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。我一定要使你难以离开我，就像现在我难以离开你。”我问宋老师，这是什么，像放电影的声音。宋老师说，“就是电影里的台词，这是我自己的录的，叫《简爱》。刚刚的音乐，是电影主题曲，简爱是一个外国女教师的名字，她像我一样，没有家庭，也不好看。”

“宋老师，你好看的”，同学们说。宋老师说，“谢谢你们。”她不响了。然后她说，“不要紧，我如果也能去外国就好了。等我们到了外国，一切都会好的……”只听得磁带，似乎又进入下一段。一个男声在急切地呼喊“简，简，简……”宋老师不出声地听着，我们也听着。那声音里的急切叫人起鸡皮疙瘩。老师不发话，我们不敢走。直到一个同学想起来的说，“我爸爸还在门房等着接我呢。”我们起身告辞。宋老师站在门口向我们挥手。

我们奔下楼梯，她站在橙黄色光线里的剪影，她的手，肩膀，裙摆，最后是脚，逐一消失。教学楼已经暗下来了，平时熟悉的墙壁和台阶骤然显出陌生。每个转角后似乎都有未知的东西蹲守。大家害怕起来。好像刚刚闯入了不该我们闯人的世界。为了消除恐惧，我们比赛一般飞快冲下台阶，到了最后几级，似乎是不顾性命地跳下，最后大家冲到底楼，发疯一样大笑起来，一起跑向门房，那里亮着灯，我们父母正等着接我们回家。

后来听说宋老师那几年一直想申请出国，但没成功，后申请调走。直到我最后一次听到她的消息，她还是单身。其实那时的年纪还到不了惑。如果今天，我在上海街头，看见一个三四十岁的女人，我会觉得，她很年轻。

大约在宋老师离校几年后，有一次新来的英语老师让我帮忙去办公室整理些旧书。在书橱里，我翻到一本中英对照的《简爱》，花了一个下午，囫圇吞枣看完中文部分。在那本书的导读里，照例写着要批判地看待作者的历史局限性等提示，也记录了几段作者致友人的信。到了大学读英美文学时，我才找到《夏洛蒂·勃朗特书信》来读。1852年，36岁的夏洛蒂致信友人埃伦：

那不时从我心中挤出一声呻吟的不幸，是在于我的处境——并非因为我是一个单身妇女，而且很可能始终是单身妇女，而是因为我是个孤独的妇女……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，因为绝对必须忍受，而且要默默地忍受，说得越少越好。

我记得在中学校里，我第一次翻阅那本《简爱》，内页藏着英文教研组藏书章，是公家的书。但我翻到封底，看到一个小小的签名，是花体英文，宋的拼音。



## 张瑞玘：《红楼梦》甲辰本收藏者

卫洪平

俞平伯《忆振铎兄》里说：“一九五三年的晚秋，比现在还稍晚一点，黄昏时候，我从团城他的办公室，带回来两大包的旧本《红楼梦》，其中有从山西新得的乾隆甲辰梦觉主人序本，原封未动，连这原来的标签还在上面。……他供给我这些珍贵的资料，原希望我把校勘《红楼梦》的工作做得更好，哪知道后来我不能如他的期望。”《俞平伯年谱》（孙玉蓉编纂）载入此事。

俞平伯校勘《红楼梦》用了八种本子，每一种都有个简称，甲辰本排第四，简称“晋”。《红楼梦校勘记》所用本子及其简称的说明》里括注：“近在山西发现。”我浏览了数十万字的《红楼梦八十回校字记》，处处能见到“晋”的踪影。

关于甲辰本的价值，俞平伯《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序》里说：“到了雪芹身后，《红楼梦》即以八十回的抄本在社会上流行着。……现在我看到的就是三种：（一）乾隆甲辰年（一七八四年）梦觉主人序本八十回。”又说：“比较重要的还推甲辰本。……程高是否看到这个甲辰本不得知。……前八十回今本的规模，在甲辰本上已大体有了。”“如就追究流变来看，甲辰本便很重要，它为程排甲本和以后的各刻本前八十回的祖本。”这个简称“晋”的“很重要”的甲辰本，后来藏到国家图书馆，分装八函，共有四十册。山西怎样发现它的？六十年来没有任何消息。我业余做一点乡邦文献研究，春节期间遇到与甲辰本有关的线索，探究了一番，我发现，甲辰本的收藏者不是别人，正是我去年以来一直为他编着年谱的谱主——清末民初的政治人物、诗人、藏书家张瑞玘。我感到意外的惊喜。

张瑞玘（1872—1928），字衡玉，号老衡、鸢野野人，山西赵城县（今洪洞县赵城镇）人。他是光绪癸卯科（1903）进士，先后作过韩城、兴平、

长安的知县，早期同盟会员。辛亥革命后回到山西，成为首任山西财政司长，旋被任命署山西民政长（辞未就），民国二年当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。1919年南北和议初期，陕西停战问题如虎当道，亟需公推一位“德望夙著者”充任陕西停战划界专员，为和议清除障碍。南北政府和双方代表把目光聚焦在张瑞玘身上，他成了中外瞩目的风云人物。这年2月到5月，《申报》连续以显著位置对他“骑虎入关”作了跟踪报道，该报总主笔、著名报人陈景韩称：“和议之进行与否，悬于陝事之手；陝事之能了与否，悬于张瑞玘之手。”在这样的历史关头，张瑞玘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，其功绩已载入《中华民国史》（李新、李宗一主编）。

张瑞玘雅好藏书。民国初年他在赵城建“谁园”，将一座中西合璧的藏书楼矗立于汾河之滨。1915年已有“谁园五万卷藏书楼”之谓，后积至十万卷。三晋大儒、藏书家郭象升《太原市上购书歌》与张衡玉：“赵城张五我畏友，书海一钓连六鳌”（张在族兄弟中排第五）。章太炎为张瑞玘亲撰的墓表说：“君素好学，自陝西归，载书百篋，为北军略夺皆尽，晚又得十万卷储之，戒其子曰：所以遗汝亦足矣。善诗书画，自谓书不如画，画不如诗，诗不如其为人，盖笃论云。”伦明（哲如）《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》

“赵城带草绕谁园”，文曰：“赵城张衡玉瑞玘，收蓄尤富，屋曰谁园，本省旧藏多并其中。”《山西藏书家传略》（薛愈编著）为他单独立传。当年上海报纸报道《国民党学者张瑞玘逝世》的消息，称他是“民党才子”、“北方学者之宗焉”。贾逸君《中华民国名人传》将他归入“文学”类。

1952年，正值张瑞玘八十诞辰，他的儿子小衡（亦称筱衡）给山西省政府副主席王世英（洪洞人）写信，愿意把谁园十万卷藏书全部捐献给人民政府。王世英在集体办公时念了小衡的信，当场交给文教厅厅长池庄办理。同年5月，省文教厅副厅长崔斗宸专赴赵城迎取。5月31日山西省人民政府文教厅致函小衡：“此种慷慨捐献、化私为公的精神，与爱护祖国文物的热忱，殊堪嘉尚，除呈报中央备查并俟将书全部整理完毕再行登报表扬外，特先函谢！”据小衡长子回望回忆，省里曾汇给张家500元，小衡谢绝了，全部退回。那时小衡给自己留下的，只有父亲残存的诗稿、赴陝划界的函电底稿，还有他为父亲编辑、迄未刊行的《谁园集》十二卷。章太炎去世前见过这个未刊稿。

谁园十万卷藏书运抵太原后，省图书馆工作人员按经史子集分类整理，每部古籍都钤一枚长方朱印——“张衡玉遗赠”，到年底登录完厚厚一大册《谁园书目》。书目子部105号是：

“抄本，《红楼梦》，四十册，八十回。”左旁标注：“105号《红楼梦》由崔厅长交黄副主席带往北京。”当时山西省人民政府只有两位副主席，即王世英和邓初民，“黄副主席”当是“王副主席”之误。大概急着盖“带往北京”，整理人员没来得及盖上“张衡玉遗赠”的朱印，但在登录书目的时候，他们在子部的末尾补录了《红楼梦》抄本，且注明它的去向。山西图书馆前辈们谨严不苟的职业操守，令人钦敬。

从那以后，“黄（王）副主席带往北京”的《红楼梦》八十回抄本，就没有下文了。

几天前我看到一份资料：1957年初，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瑶来山西视察文教工作，对部分大、中学校和文化单位的图书管理及利用情况提出意见。2月25日《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转发王瑶意见书》（编号【57】办秘理字第25号），附录了三百多字的意见书，里面王瑶讲到：“1954年赵城某氏捐献藏书，其《红楼梦》已在京，很有价值。”王瑶是山西平遥人，在学界很有影响，当年分管文教的王世英副主席，将《红楼梦》抄本带往北京，很可能先拜访王瑶，请他过目，再正式送交给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。“赵城某氏”无疑就是“赵城张氏”，“1954年”则系误记。山西省档案馆保存了这份档案资料。略有些遗憾的是，1953年郑振

铎没有日记，《郑振铎年谱》（三卷本，陈福康编著）、王世英的资料中也没有记载这件事。

虽如此，笔者认为，王瑶所说“已在京”、“很有价值”的《红楼梦》，就是“黄（王）副主席带往北京”的那个八十回抄本，亦即俞平伯1953年晚秋从郑振铎处“带回来……从山西新得的乾隆甲辰梦觉主人序本”。也就是说：那个简称“晋”的甲辰本，在山西先是由民国政治人物、诗人、藏书家张瑞玘收藏；其子小衡清受后又任谁园藏书楼保藏了二十四年，后来无偿捐献给国家；分管山西文教工作的省政府副主席王世英（洪洞人），1953年亲自带着甲辰本进京，将这一珍贵文物送到保护管理国家文物的最高行政机关。

1989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《甲辰本红楼梦》，冯（其庸）序称，甲辰本“独标《红楼梦》”，“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本子”。近年又有几家出版社出了影印本或排字本。从网上看，红学专家对甲辰本的研究还在不断深入，许多读者对这个抄本也充满兴趣。逝者已矣，在学界很有影响，当年分管文教的王世英副主席，将《红楼梦》抄本带往北京，很可能先拜访王瑶，请他过目，再正式送交给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。“赵城某氏”无疑就是“赵城张氏”，“1954年”则系误记。山西省档案馆保存了这份档案资料。略有些遗憾的是，1953年郑振